本辑焦点：文化心理学 (Cultural Psychology)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五辑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5)

文化心理学：跨学科的探索（代卷首语）——————————————————谭冰

文化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与研究进路：兼论其与心态史学的关系

——金观涛

心理学与文化——————Harry H. Triandis 赵志裕 Mark Schaller

文化与思维系统：整体性认知与分析性认知

——————————Richard E. Nisbett 彭凯平 翟仁青 Ara Norenzayan

表征与文化解释的视念——————————————————————赵志裕

多元文化心灵

——————————————Michael W. Morris 赵志裕 Veronica Benet-Martínez

婚化性概念、策略与共享：社会表征的对话主义立场——————刘力

人缘：中国人舆论生活的秩序——————————————金盛华 陈生梅

自我的结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5辑/徐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97-1745-5

Ⅰ.①中… Ⅱ.①徐… ②中… Ⅲ.①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文集 Ⅳ.①C9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1376号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五辑

特约主编／徐 冰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59367077
责任部门／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156
电子信箱／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童根兴
责任编辑／郑 嫣
责任校对／杨俊芳
责任印制／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347千字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1745-5
定 价／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委　　员： 陈午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刘　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徐　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杨　宇　美国南加州大学心理系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赵旭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文化心理学：跨学科的探索（代卷首语）…… 徐　冰 / 1

文化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与研究进路：兼论其与

心态史学的关系 …… 余安邦 / 44

心理学与文化…… Darrin R. Lehman　赵志裕　Mark Schaller / 85

文化与思维系统：整体性认知与分析性认知

…… Richard E. Nisbett　彭凯平　崔仁哲　Ara Norenzayan / 113

表征与文化解释的观念 …… 赵旭东 / 158

多元文化心灵

——文化与认知的动态建构主义进路

…… 康萤仪　Michael W. Morris　赵志裕　Veronica Benet-Martínez / 195

敏化性概念、基耦与共享：社会表征的对话主义立场 …… 刘　力 / 217

人缘：中国人舞台生活的秩序 …… 余德慧　陈斐卿 / 234

自我的结构 …… 流　心 / 266

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 余英时 / 289

CONTENTS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Xu Bing* / 1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Approach of Cultural Psychology: Some Discussions about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story of Mentality *Yu An-bang* / 44

Psychology and Culture *Lehman, R., Chiu, C. and Schaller, M.* / 85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Nisbett, Richard E., Peng Kaiping, Choi Incheol, Norenzayan, Ara* / 113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dea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Zhao Xudong* / 158

Multicultural Minds: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Hong Y., Morris, Chiu, C. and Benet-Matinetz* / 195

Sensitising Concept, Themata and Shareness: A Dialogu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Liu Li* / 217

Yuan: The Order of Living Platform of the Chinese People *Yee Der-hui and Chen Fei-qing* / 234

The Otherness of the Self: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Liu Xin* / 266

The Historical World of Xi Zhu: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Shidafu (Intellectuals) of the Song Dynasty *Yu Yingshih* / 289

文化心理学：跨学科的探索（代卷首语）

徐　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一个主旨就是关注文化问题，而且着重关注中国文化问题。这一点从前四辑的主题就可以看出来，它们中都有“文化”一词。第一辑的主题是“自我与文化”，第二辑是“面子与文化”，第三辑是“组织行为与文化”，第四辑是“性格与文化”。因此，在这本评论的传承中“文化心理学”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概念。但是，前几辑没有正面讨论这个概念，而这正是本辑的任务。

曾经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心理学实验室的冯特，后期把更多精力花在建立一个关注历史与文化的心理学上，他认为这种心理学才能理解心灵的深层。由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对主流心理学的严苛统治，冯特的后期努力长期为学院心理学所忽视。但是，他的观点却引起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应。涂尔干的合作者和继承者、法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家莫斯指出，社会学的关键——集体表征可以称为集体心理学，或者心理学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纯粹社会学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沿着这个思路，他晚年提出中国社会学要阐释“心”。他所说的社会心理学实际上便是文化心理学。

在当代方法论讨论的推动下，冯特提出的问题引起学院心理学的关注，心理学的文化心理学分支应运而生。而此时，在文化心理学概念资源的积累上，学院心理学已经落后于人类学与社会学。

因为涉及复杂的方法论问题，本辑评论有明显的理论偏向。它共选编9篇文章（或者著作章节），包括2篇回顾和2篇比较纯粹的理论论文（心理学和人类学各1篇）。另外5篇是关于具体研究的，但它们是具体研究的理论构思或者具有理论意味的章节。这5篇文章或者著作章节涉及实验

心理学、社会学味道浓厚的社会心理学、诠释现象学进路的心理学、本体诠释学进路的民族志和具有心理分析意味的史学著作的章节。为帮助读者把握学科和方法论跨度如此之大的领域，这里先做一个篇幅较长的导论。

一 文化心理学的范围

本辑选编的两篇回顾性文章勾勒了美国或者北美文化心理学的历史与近期概况，它们是我初步介绍文化心理学范围的线索性资料。而《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主旨是推动关于中国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选文章都是华人学者独立或者参与完成的。在北美与中国学术关系的问题上，我把北美学者的相关讨论当做国际学术的共享资源，参考它们来理解文化心理学的概念。我将尽力把这个概念与华人学者的研究联系起来，把目的指向中国文化心理学。本辑评论所涉及的北美学者包含华人学者，他们的研究更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宝贵资源。

受所掌握资料的局限，这篇导论无法概括近期欧洲等地的文化心理学状况，并希望以后某辑评论能补上这一课。但是，本辑选编了一篇以近期欧洲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为基础概念的中国研究。这个概念是在法国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概念基础上提出的。我将在下一节提到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心理学大师对当代方法论进路的影响，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弥补这一节依赖有限资料的局限。对这篇关于社会表征概念的研究，可以参考关于涂尔干的讨论来理解。

在本辑选编的两篇回顾中，第一篇（余安邦，1996）勾勒了自 20 世纪上半叶至 1990 年代中期的文化心理学的历史以及主要进路，第二篇（Lehman，Chiu and Schaller，2004）介绍了 2000 年前后近十年间心理学中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概况。第一篇文章视野较广而且难度较大，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以及一系列方法论概念。我将在这一节里以这篇文章为线索初步讨论文化心理学的范围，在下一节中勾勒相关的学科背景与方法论脉络。第二篇涉及的范围比较小，它会给心理学研究者的具体研究带来很大启发。它的表述简明流畅，而且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有契合之处，因此读者可以自行阅读。

余安邦（1996：3）指出，引起当代学者注意的文化心理学（culture psychology）讨论可以追溯到德沃斯与希普勒在 1969 年《社会心理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中发表的一篇文章（DeVos and Hippler，

1969）。社会心理学首先是心理学、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这个领域的文化心理学探讨是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参与的当代“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中的一种努力。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心理学亦与人类学相交叉。因此，我们这里所谓文化心理学首先指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一个研究领域。

心理学、社会学所参与的当代文化转向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所推动的，这场讨论促进了各学科之间的重新整合，这使当代文化心理学牵涉的学科也更多。这个领域近期的一位主要倡导者施韦德（R. Schweder，1990，1993）指出，文化心理学是一个综合各种有关人的科学的研究领域，它的目的是理解在不同历史与文化建构而成的世界中人类心灵的多变性。参考他的讨论，历史学、语言学与哲学也是文化心理学的重要资源。

心理学的努力

在当代文化转向的心理学探索中，并非所有学者都赞成文化心理学这个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哥根夫妇（K. Gergen and M. Gergen，1997）就将这个概念与“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一并加以批评。他们指出，当代关注文化问题的心理学探索共享一个主旨，那就是突破经验主义心理学的普遍化取向（universalizing orientation）。而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在这个方向上走得都还不够远。

他们指出，1970 年代以来的跨文化心理学不过是经验主义的普通心理学（general psychology）的奴仆。它要寻找的是跨文化脉络中的普遍性，它所展示的文化差异也是基于某种普遍的心理过程。1990 年代以来的文化心理学则是对跨文化心理学的戏剧性逆反。跨文化心理学只把文化看做普遍心理过程的变化场所（site of variation），而文化心理学反过来视文化为心理过程的衍生场所（birthing site）。文化心理学在尝试突破经验主义心理学局限的时候，却对经验主义的普遍主义后设理论（meta-theory）保持沉默。哥根夫妇认为，能够去除西方经验主义对心理学之殖民化的是“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cultural constructionist psychology）。这种心理学的思想资源是当代的文化建构主义。这里的文化建构主义是一系列理论的混合体，包括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文学与修辞学理论、后现代理论，以及形式各异的意识形态批判。

余安邦介绍文化心理学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给杨国枢等领导的华人本土心理学带来启示，他认为（华人）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是两个既有所重叠又有所不同的概念。

我想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化心理学的概念，使它涵盖当代文化转向中的各种心理学努力，其中也包含华人本土心理学。

当代华人社会科学本土化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延续，它延续了中国化的主旨：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凸显文化的主体性也是当代文化转向的主旨。中国化、本土化概念的出现与中西社会科学力量的不平衡有关。在西方社会科学占主导地位而中国社会科学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中国研究者常常只能沿用西方的概念与理论。一些衍生于西方的概念与理论隐含着西方的价值倾向，但是主流经验主义宣称它们是普适于人类的。在心理学等经验主义所主宰的领域，常常是在某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出现之后，很多研究者就围绕这个概念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研究。像杨国枢这样在美国受到一流学术训练、自己的研究也为国际同行所认可的心理学家，经过多年的科学实践之后，也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西化”的轨道。他认为即使跨文化心理学也是以“西化”的尤其是美国本土化的观点为基础的。他担心如果大多数中国研究者进入“西化”的轨道，他们就会渐渐失去在中国本土脉络中创造概念的能力。他希望中国研究者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希望他们在自己的本土脉络里发现问题、创造概念，建立具有自己文化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杨国枢，1993）。

我认可杨国枢等对中西社会科学不平衡状况的判断，也认可中国化、本土化的主旨。同时，我认为当代华人社会科学本土化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所推动的文化转向运动之一，抓住这个方法论脉络可以使我们对本土化的努力有更好的理解。杨中芳是较早提倡本土化的华人心理学家，她的本土化观点受到哥根所领导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危机”运动的影响（杨中芳，1997）。哥根的危机意识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Gergen，1988），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洞见在当代方法论脉络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代诠释学（hermeneutics）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理解不可能完全排除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影响。相反，先前理解是理解的必要条件。而且，先前理解是为一定文化语言所塑造的。因此，在涉及文化问题时研究者要慎言自己的概念是普适于人类的，否则他们可能陷入种族中心主义的泥潭。但是，反对种族中心主义不等于否认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属性，否则又会陷入相对主义。而“对话”（dialogue）的思想和方法可能同时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参见 Smith，2002：121－138）。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研究者的原创性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加以发挥，同时，在中西社会科学不平衡的状况下进入“西化”的轨道会限制中国研究者原创力的发挥，因此本土化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但另

一方面，当我们说起“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中已经隐含了存在其他文化和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理解中国文化的意味。因此，原则上，跨文化研究与本土化研究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所要反对的是仅以“西化”的概念作为跨文化研究之基础的种族中心主义。

受诠释学的启发，这篇导论对文化心理学持比较宽泛的理解，中国本土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以及文化建构的心理学等都在它的范围内。把这些心理学纳入文化心理学的观点丝毫不会贬低这些探索的价值。相反，我认为在中国文化心理学中，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占据重要地位。即使采取这个宽泛的视角，我们所能回顾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在历史积累有限的条件下，我们更适合采取包容的态度。

人类学的贡献

余安邦（1996）指出，文化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1970年代前追求普遍心理机制与稳定的文化模式，②1970～1980年代中期注重社会文化脉络与语言意义，③198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诠释学的理解。

其中，余安邦在第一个阶段上所花的笔墨甚少，因为那时文化心理学的概念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当德沃斯与希普勒于1969年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用它指涉的是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和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是20世纪上半叶到60年代的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派，其中人类学的贡献最为突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的《菊花与刀》是这个学派的经典之作，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宗族·种姓·俱乐部》也可纳入这个学派。到了这个阶段末，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易名为心理人类学。按照主流心理学所信奉的实证主义，上述文化与人格研究不够“科学”。在心理学中，同文化与人格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人格心理学，但是这个心理学分支在20世纪上半叶尚未着力于文化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中才开始出现文化心理学分支。而那时，这个分支等同于跨文化心理学，它所使用的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关于文化与人格学派以及心理学中文化心理学分支的出现，杨宇（2008）在这本评论第四辑的“卷首语”中有更详细的介绍。

在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文化心理学已经加入社会科学整体性的文化转向之中。从余安邦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中结构主义符号学

的影响较大。到了第三个阶段，反思实证主义的思潮汇聚起来，其中诠释学的影响最为突出。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施韦德也是一位人类学家，可以说美国文化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是人类学提供的。

施韦德现在同时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和比较人类发展两个系。在心理学系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在比较人类发展系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他的研究兴趣是心理人类学与文化心理学。从这些简单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重叠关系。施韦德（2007）在一篇追忆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 Geertz）的文章中表明，他是格尔茨的崇拜者、学生辈以及合作者。格尔茨是 1960 年代美国“符号”或者“阐释”人类学运动的领袖，他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是在当代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80 年代初，格尔茨参加了施韦德组织的一项“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借鉴近期的文化理论来复兴文化心理学。在施韦德（1993）的讨论中还可以看出，格尔茨的“厚描”是他阐释文化与心灵之间关系的重要资源。

在人类学的文化心理学探索中，华人学者许烺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以心理人类学一词取代文化与人格研究，他的一篇文章（Hsu，1971）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之作。这篇文章经过修改之后再次发表（Hsu，1985），在十几年后仍然是文化心理学的领军之作。这便是这本评论第一辑所选编的第一篇文章，它堪称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贡献

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双重性格的学科，它一方面有自己学科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有整合社会科学的兴趣。因此，社会学家在探讨当代文化转向的问题时会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整体转向纳入考虑。

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和史密斯（J. Alexander and P. Smith，2001）指出，约一百年前，韦伯和涂尔干等社会学奠基人的著述不时闪烁着文化的光辉。但是，这些光辉后来被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帷幕遮掩，致使后来的主流社会学麻木于理解文化的意义。一度占据主流社会学地位的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肯定了价值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解释价值本身的性质。它太过抽象，而缺少诠释学的维度。直到 1960 年代，功能主义走下神坛，其他社会学流派竞相争鸣，文化的问题才又突出起来。在 1970 年代早期，英国的社会学开始进行文化转向。而在美国，直到 1980 年代中期这个转向才变得鲜明起来。在欧洲大陆的社会学中，文化可能从未退场，但是相关思想在

1960 年代后，在与英美的文化转向汇合起来时，才得以享誉全球。

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指出，在当代的世界学术范围内，文化已经走向人文与社会科学舞台的中心。亚历山大自己的文化社会学概念是受到当代一些重要的智识事件的启发：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诠释学的重新发现，人文科学中的结构主义革命，人类学中的符号或者阐释运动，以及美国史学中的文化转向。他还指出，在这些当代智识事件的背后是持续发挥其生命力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不仅渗透于理智生活，而且遍及日常生活（Alexander，2003：6）。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亚历山大和史密斯（Alexander & Smith，2001）倡导一种能够凸显文化自主性（cultural autonomy）的文化社会学。这种“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与实证主义传统中“关于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有所不同。“关于文化的社会学”把文化看做因变量，认为文化可与意义本身区分开来，可以用关于社会结构的物质与工具要素来解释。而文化社会学把文化看做一个自变量，认为文化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文化塑造行动和制度，为行动和制度的每一片段注入生机，拥有堪与物质或者工具媲美的力量。

他们指出，文化社会学需要一个新的进路，它的哲学基础是诠释学。他们认为，狄尔泰（W. Dilthey）于一百年前所表达的、透视社会结构之内在意义的诠释学至今仍是最有力的方法论理念，而格尔茨的“厚描”概念以及一系列文化分析是应用这一理念的当代典范。但是，他们认为格尔茨仍有不足：他后期过于偏重以地方的解释地方的，而拒绝把他的阐释性分析与任何普通理论（general theory）联系起来。为了建立普通理论，亚历山大和史密斯希望在诠释学的基础上吸收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而形成一个更具结构性的进路。他们把这个进路称为结构诠释学（structural hermeneutics）。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晚期涂尔干的理念有契合之处，而晚期涂尔干的理念是亚历山大等所要复兴的古典社会学理念。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社会学关心集体的心态（mentalities），它们属于社会实在。这种实在是由集体表征传递的，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所对应的观念就是集体表征。社会学要透过语言、符号把握实在，理解实在是如何赋予符号真实意义的（Durkheim，1995：1－18，433－440）。亚历山大继承了晚期涂尔干透过语言、符号理解社会之内在真实的理念。他指出，社会结构的内在一面是由文化话语所塑造的，而人们常常不能充分理解这些话语的意义。文化社会学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制约社会的、无意识的文化结构呈现

在心灵的光明之处。因此，文化社会学是一种社会的心理分析（social psychoanalysis）（Alexander，2003：3－4）。

由于社会学的整合兴趣，文化社会学关注具有心理学意义的问题并非偶然。而且，亚历山大继承了晚期涂尔干关注心态问题的理念，这便使文化社会学与文化心理学有了更大的重叠面。

费孝通晚年提倡建立“文化自觉”的社会学。他（2003）指出，文化自觉的社会学要从诠释学的角度来阐释“心”。“心”是中国传统中表达主体性的重要概念，中国学者对它的阐释可能为国际社会学作出原创性贡献。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社会学概念颇具诠释学意涵，而与亚历山大等倡导的文化社会学概念具有相似之处。因此，中国文化自觉的社会学与中国文化社会学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而中国文化社会学中对“心”的阐释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学。

余安邦（1996：36～45）指出，文化心理学与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以及法国年学鉴派心态史学（mental history）有重叠的意涵。心理史学是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解释历史事件背后的动机的研究，它的开山之作是埃里克森（Erikson，1958）对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的认同危机的分析。而年鉴学派使用了晚期涂尔干的心态概念，认为心态属于社群、阶层，而不属于个人。即使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人，它所探讨的也是这个人与他同时期、同文化的人所共有的心态。与涂尔干一样，年鉴学派持方法论集体主义观点，而与持方法论个体主义观点的心理学相区分。

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在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可以消减的。文化心理学常常从个人切入，但根本上，个人心理生活的内容是在人们共享的文化语言中的对话，而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诠释学采取了整体论的本体论观点，但这个立场不是上述二元对立中的任何一方。因此，文化心理学不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样看来，心理史学与心态历史学中诠释心理（psyche）与心态（mentality）的努力亦具有文化心理学意涵。

总结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心理学不仅包含当代文化转向中以心理学为中心词的各种努力，还包含文化人类学中的重要部分，并且与社会学、历史学中的重要努力相互交织。进一步拓展视野，文化心理学还可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努力相互交叉。因为掌握的资料有限，我这里不能展开相关讨论。但是，这篇导论所提倡的文化心理学并不宽泛到包含所有关于“文化心理”的描写与议论，它只限于有明确的方法论指导的研究。

二　方法论问题与古典根源

没有哪一个简明的定义可以涵盖上一节所提到的各种文化心理学力量。自然科学的经典学科有这样的定义，它们的关键是研究对象的性质。物理学研究物质的特性及其能量变化，化学研究物体组合及其变化（孙本文，1974：35），由此这两门科学的范畴分别是关于这些对象的研究的集合。上一节对文化心理学范围的介绍是归纳的，它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的历史学之间一些力量的汇聚。这些力量既不能穷尽，也不能归入一个简明的分类公式之中。因此，我们都要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加深甚至修改对这个范围的认识。

如果读者还能因为这样的介绍而信任文化心理学这个领域，那部分是因为他们对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几门科学的信任。它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们的前沿分支应该具有科学价值，有理由说一些分支指向文化心理学的领域，虽然还不能给出一蹴而就的解释，但是初步的解释已经能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领域了。的确，这些学科有科学的基础，这是上一节那样表述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些学科的科学基础与物理学和化学还有不同。它们中的每一门都难以给出自然科学般的定义，这是因为它们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

其实，人们也很难仅凭上述定义就对物理学和化学的对象性质以及这两门学科的范围有深入的了解，对这些科学的深入了解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积累的。但上述定义还是给我们留下一目了然的印象，它们既简单又客观。我们期待这两个定义中的概念不会产生歧义，这两门学科中的其他概念也不会产生歧义，我们相信这两门学科的基础就是靠这样一些概念来建立的。但是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没有这样的基础。它们中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新的定义是在批评、反思以前的定义的过程中推出的。产生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科学的对象是人，而对人难以给出对物那样的定义。

人是什么？每个人都能就这个问题说些什么，但没有谁的回答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这个问题引出了古今中外无尽的哲学讨论。社会科学创造一些概念，以这些概念建立一些维度，并且在这些维度中积累了一些以经验为基础的验证方法，因此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作出特殊的贡献。但是这些科学不能在根本上改变人的性质。因此，它们的基础概念也难以像自然科学的那样不会产生歧义，而且整理这些基础概念并重新阐释它们成了这

些科学中的一项基础工作。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 Allport）在1930年代就回顾了50种“人格”定义，人类学家克罗伯（A. Kroeber）和克拉克洪（C. Cluckhohn）在1950年代就回顾了160多种“文化”定义。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诠释学的观点：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包含阐释的成分，而且这是基础成分。也即，在面对人的性质这个根本问题时，科学家和常人的回答有相似性，它们都有阐释的成分。这类回答不能满足自然科学的要求，但是它们可以不断揭示人的实在。因此社会科学的基础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有所不同，它是在概念的不断梳理、反思和重新定义过程中积累的。在这样的学术背景里，人们是难以给文化心理学下一个既简单又客观的定义的。

一般学生对社会科学概念的简单和客观的期待与实证主义的影响有关。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方法论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意思含混的形容词“实证”有时成了形容词“科学”（scientific）的同义词。人们口中的“实证”有时指实证主义的（positivist），有时指经验的（empirical）。正因为不很了解这些意思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人们才更加迷信“实证”一词。本辑评论选编的一篇文章（Nisbett，Peng，Choi and Norenzayan，2001）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些方法论误解，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跨文化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尼斯贝特（R. Nisbett），第二作者是这个领域优秀的华人学者彭凯平。

这篇文章的开头指出，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洛克[①]、休谟和穆勒把认知描述为所有正常人都相同的过程，20世纪主流心理学采取了这个普遍主义假设。从皮亚杰对认知心理学的早期处理，到20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再到近30年的计算机模式的认知心理学，这个假设一直占据优势。按照这个假设，文化与认知的关系不是一个值得特殊研究的领域。但是这篇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它专门讨论文化对认知系统的影响，讨论东亚人的整体性认知与西方人的分析性认知之间的差异。与这个关心相联系，它的基本假设也与实证主义不同。它的结尾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 Levi-Strauss）的话说，在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时，人们都像带着认知工具袋的杂工。即使所有文化拥有本质上相同的基本认知过程作为工具，但对于相同的问题，它们选择工具在习惯上还存在着很大差异。文化决定了工具袋里工具的排列形式，塑造了人们在某种情况下使用扳手还是钳子的习惯。

列维－施特劳斯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而结构主义是一个与实证主义

① 洛克（1632～1704）的主要思想和著作是在17世纪形成并发表的。

抗衡的进路。尼斯贝特等是实验心理学家，按照上述含混的理解，他们做的实验研究肯定是“实证”研究，而且是“科学”程度最高的一种“实证”研究。但是从这篇文章的两个片段就可以看出，经验研究、实验研究不一定是实证主义的。为澄清相关误解，下面将略花些笔墨讨论实证主义的概念。

孔德、涂尔干的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于19世纪上半叶创造的概念，正是在实证主义哲学的讨论中他创造了社会学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心灵与知识的发展由低到高经历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乞灵于抽象的实体（如大自然）不同，实证主义观察现象并寻找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可见，实证主义有重视经验、反对形而上学的意思。但是，这里的实证主义不是经验主义的。孔德把各门实证主义科学进行一番排列，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等。率先成熟的是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生物学比较靠后，社会学最后。而越后成熟的科学等级越高。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科学是分析优先的，但是从生物学开始转向综合优先，最后社会学以整体优先于局部为基本观点（阿隆，2000：49～50）。而追寻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社会”的规律所涉及的资料不限于可以直接看到的经验，这种追寻非有出色的理论能力不可。因此，孔德认为理论在社会学中十分重要，甚至超过经验研究。这个观点与20世纪的主流实证主义，即通过感性观察和过分偏重量化处理的经验主义有很大不同（Ritzer，2004：82）。

孔德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建立了哲学基础，而涂尔干的《自杀论》为这个进路的具体研究树立了榜样。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突出社会事实的整体论特征，涂尔干刻意与个体心理学区分开来。他并不像今天很多社会学调查那样用问卷从个人那里采集数据，这种调查需要心理学态度理论的支持。他采用各类人群的自杀数据，并建构社会类型以解释这些数据。在这本几百页的著作之中，理论讨论占据绝大部分的篇幅。

晚期涂尔干更加重视不易量化的社会事实——集体表征。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导论中，他仍然说社会学是“实证”（positive）科学。这里的“实证”是沿用了孔德的词语，可与实证主义（positivist）互换。但是，他要揭示人性本质的、永恒的方面，这是不能完全由直接经验验证的问题。为此，他阐明了自己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立场。以往的理性主义是先验论，认为范畴在逻辑上先于经验并决定经验。经验主义则

相反，认为范畴来自感性经验，而且是个人从这些经验中建构起来的。涂尔干指出，先验论没有解释范畴的成因，这是它的缺点。但是，它保留了范畴的专门特性：它们不能还原为个人的直接经验。涂尔干相信范畴具有这样的特性，他要对这样的范畴做社会、历史成因的解释：它们是集体或者社会中世世代代的经验和知识长期积累而成的。基本上，范畴就是集体表征（涂尔干，1999：1～24；Durkheim，1995：1－18）。这样的集体表征不易量化，而有不能还原为直接经验的形式结构。后来学者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出结构主义进路，以对抗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

涂尔干是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张力。因此，后人既可以把他看做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也可以把他看做结构主义的先驱（贝尔特，2002：6～7）。同时，他的思想有连贯的线索：他预设了整体论的本体论；他修正了理性主义，而与经验主义保持距离。因为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整体论特征，所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准则一直没有主流心理学那样严苛。

逻辑实证主义

20 世纪主流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可以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表示，而实践这种方法论的典型是行为主义心理学。

自 1910 年代问世时，行为主义就自称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粹客观的实验分支，以马赫（E. Mach）等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这种实证主义也称素朴（naive）实证主义，海克曼（S. Hekman，1983：2）概括了它的基本观点：科学活动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归纳；科学家要使用理论中立（theory-free）的语言观察事件是“怎样”而不是“为什么”发生的；科学家不能对“无法观察的实体”（unobservable entities）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不是科学的任务；可以直接观察的内容构成“实在”的世界，对这个世界中的事件进行理论中立的观察和归纳能够获得客观真理。按照这个哲学，行为主义宣称只研究外显行为，而放弃对内在心灵的关心。在 1920 年代，维也纳的哲学家把理性主义的核心——逻辑纳入经验主义之中，建立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这使实证主义由偏重归纳转向偏重演绎（贝尔特，2002：229）。逻辑实证主义也称逻辑经验主义，因此在当代方法论脉络中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概念常可以互换。行为主义吸收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它反过来成了这种哲学的代言者。

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行为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操作定义”